

新文化叢書

中國思想小史

常乃惠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 國 思 想 小 史

常 常 乃 惠 著

中國思想小史目錄

(天)

導言	中國五千年來思想變遷的鳥瞰	一
第一章	原始中國民族的神話思想	一〇
第二章	宗教與倫理觀念之進化	一八
第三章	神權思想之衰落與人事觀念之代興	二六
第四章	宗法社會思想之圓滿的發展	三三
第五章	貴族社會中的一般思想	四一
第六章	學術的解放與思想的分化	四九
第七章	各派思想之凋落混雜及神秘思想之復興	六五
第八章	懷疑時代的曙光	七三

第九章	佛教的輸入	七九
第十章	新佛教宗派的創造	八六
第十一章	唐宋間理學未興前之新形勢	九四
第十二章	宋朝理學的起源及其成立之經過	一〇一
第十三章	理學的大成和獨占	一一八
第十四章	程朱學的衰落與王學的興起	一三四
第十五章	理學的反動時期	一四九
第十六章	考據學全盛下之清代思想界	一五六
第十七章	思想的解放與今文家的活動	一六〇
第十八章	歐洲思想與昔日之中國	一六六
第十九章	政治思想與實際政治運動	一七二

第二十章

新文化運動的黎明時代

(天)

一七九

第二十一章

新文化運動的成績

一八四

中國思想小史

導言——中國五千年來思想變遷的鳥瞰

思想史與學術史同呢？不同呢？說不同，所採的材料，所用的方法，未嘗不大同小異，說同呢，內容所講的確乎彼此兩樣。學術史——或者哲學史——所注重的是學說的內容，師徒傳授的門戶派別，以個人爲中心的學者傳記等等——思想史對於這些却全不注重，牠所注重的乃是一時代思想遞嬗的源流大概，及於當時及後世的波動影響，講學術史儘可以個人爲中心，多少忽略時代和地域等背景，講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時代、地域等々交互的影響。近來學術史乃至哲學史的著作也都漸漸拋棄以個人爲中心的學案體，而趨重於環境的影響之敍述了，從此以後思想史的位置，將比學術史——特別是哲學史——的位置還高了。

中國有學術麼？這話是不能輕易回答的，因爲真正以科學方法爲根據的學術，在歐洲

也不過二百年來的事，在中國今日則甫在萌芽，尙無供歷史記載的資格，更談不到學術二字。中國有哲學麼？自周秦諸子以來，百家爭鳴，其中未嘗無近乎哲學性質的學說，不過中國的民族性是平易務實，所有主張多務求有裨實用，並不好為幽深玄遠的思辯，因此發達為純正哲學的機會甚少，只有六朝以後，從印度輸入的佛教思想，頗有哲學的意味，但一到中國，學風也漸漸趨於實際，不是純印度的舊來色彩了。地域環境之移人如此，因此在中國求為學術史或哲學史的記載是很不容易的。但五千年孕育深厚的民族，其發為思想自然不無可觀，以民族的固有天性和環境鑄成思想，以思想之力又鑄成民族，彼此循迴影響，遂造成今日龐大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民族思想，對於全世界都有莫大的影響，這種情形又是我們所決不可放棄過了的，因此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就絕對不可緩了。

我們要對於中國民族思想的內容作詳細的研究，就不可不先將五千年來演化的源流，大概先為鳥瞰的解剖，使讀者心中對於全盤情形先有一番了解，然後再進而為細密的敍述，才不至茫然無措，因此本章先將這種思想演化的大體情形，作一番鳥瞰的敍述。

思想不是平空發生出來的，他是民族精神結晶的表現，民族精神也不是天造地設一

成不變的，他的成因，一半是民族血統，一半是地域環境和時代環境所造成。要研究中國民族的思想演化情形，除了各時代的時代環境應該注意外，對於中國民族的先天氣質和地域環境也不能不注意，尤其要注意的是地域環境，因為民族的氣質如何，本來難以表現，所表現出來的，盡是受過地域環境影響以後的情形，因此地域環境就更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中國是個溫帶的國家，地方又廣大，平原和河流又多，氣候又溫暖，物產又繁盛，這樣情形之下，思想是應當早發達的。就最可靠的歷史記載言，距今四千年時代，至少已有了系統的思想的萌芽了。在四千年以前，中國民族的思想進展到如何程度，我們今日無文獻可徵，已難十分斷言了，不過從上古的種種民謡神話以及器物制度上考察起來，或者仍不無可以揣想而知之處。至於堯舜以降，多少已有書籍和器物可徵，從這時代起到西周末年止，我們可以看作是一個相近的時代，這時代中我們所有的紀載證明了一部分貴族宮庭的人已有了系統的觀念思想，而大多數平民却仍生活在不識不知的神話之中。這時代因為交通

不便民族接觸較少的緣故，至少文化的中心因民族之不同也分裂為數個較顯著的如黃河流域的諸夏民族文化，淮水流域的東夷民族文化，江漢流域的荆蠻民族文化，渭水流域的氐羌民族文化，四川中部的巴蜀民族文化，都各有其特異之點，由此產出的民族思想也各有其系統，彼此不同。除了諸夏民族之外，其他民族的本來思想因為記載簡略的緣故，我們僅能於流傳的故事神話之中，略得其一二，其詳已不可得聞，這些不同的民族思想，到春秋以後因列國接觸的結果，逐漸都加入諸夏思想系統之中，彼此混合調和，遂造成今日中國民族的整個思想了。

春秋戰國是各民族接觸頻繁的時代，也是各種思想系統彼此競爭和調和最烈的時代。原始的諸夏民族思想因為政治進化較早的緣故，發展較為完備，表現出來的是儒墨兩家的思想。儒家重倫理秩序，墨家重實用節儉，兩家為說雖稍有不同，根本的精神却無甚差別，都是發源於諸夏民族重實踐的民族性。與這種精神相反的，則有道家與陰陽家兩派。道家重虛無自然，陰陽家重鬼神怪誕，兩家為說雖稍有不同，其源却均出於東夷民族的思想，

不過一受海國的影響，氣勢較為雄大，一則發展於江漢流域，因地城豐饒的結果，思想較為高深罷了。最後出者為法家，法家起於韓魏而盛行於秦都，是西北區域，西北為氐羌族的根據地，因氣候寒冷，地勢貧瘠，雖經周秦兩代的建都，文化仍甚落後，思想無甚表現，直到戰國末年才有法家出現，其重功利尚實用的精神仍與諸夏思想系統相近，不過更加谿刻峻厲，帶有西北民族的色彩罷了。但法家的人生觀却多承自道家，其受東夷族思想之影響也不少。要之先秦諸子，法家最為後出，其受他派影響也最多，故其學說首尾完密，壁壘森嚴，可謂集古代學說之大成，後來西漢一代的實際政治都是依據法家的主張而實行的。

經過戰國末年思想發展極盛的結果，到秦漢統一以後，便有衰頹的傾向了。西漢初年的社會以前各派的分子仍然都在活動，不過都無傑出的人才。儒家只有董仲舒一派的迂儒，持門面，和叔孫通、公孫弘等無恥小人，假借名目獻媚時主。道家則也將原始那種極端破壞的思想拋棄，只以清淨無為等淺薄思想，迎合當時的人心。這兩派的末流都吸收當時流行的方士妖妄之說，與陰陽家末流相合，造成纖緯的思想，支配東漢一代的政治社會，結

果成爲道教。陰陽家更加墮落，自戰國末年就失去創始者的本意，變爲方士了。秦漢以後，這種方士逐漸吸收當時的社會上的多神思想，蔚成大宗，後來的道教便是中國多神思想的總匯，很值得注意的。法家在西漢一代最見實用，但結果耽於事功而忽略理論，因此思想方面轉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不過在實際上頗支配當時的人心罷了。墨家本來不重理論，秦漢以後更因與當時專制潮流不合的緣故，表面上銷聲匿跡，實際上任俠好義之士多帶有墨者的意味，不過因爲不尚理論的結果，漸漸數典忘祖，不知道他們的思想所自了。總之西漢一代是各派思想日就式微的時代，到東漢時代各派遂均滅亡。東漢表面上尊崇儒家，似乎思想界爲一派所壟斷，實則有經師而無儒者，有訓詁而無發明，够不上稱爲思想家。當時支配一般思想界者仍是儒道陰陽三派結合而成的多神宗教，思想界之墮落如此，無怪乎一到魏晉之際，要生大的反動了。

思想到了東漢，可算銷沈黑暗已極，妖妄的方士思想傳佈於民間，遂造成黃巾之禍。四百年來的統一大帝國，由此破裂。亂世社會不易安定，思想因之易趨激烈，遂漸漸產生對於

古代傳統思想反抗的懷疑精神。漢末的孔融，魏末的何晏王弼，晉初的竹林七賢都是時代的代表。不過當時風氣初開，規模未具，僅有對於傳統思想反抗的破壞精神，別無新的建設。加以時代不寧，民生困苦，故頹廢思想易於成立。僞列子中楊朱篇的思想即其代表。假如當時環境沒有新的發展，則思想界也未必就長此安於頹廢，或者就老莊哲學的路，發展為一種名理探討的新精神也未可知。不過費的時間總要長些。乃時勢湊巧，因種族徙的結果，西域交通之路大開，印度的佛教思想竟大舉輸入中華，給頹廢饑渴的思想界以一種新興劑，從此思想界的工作都集中到繙譯事業上去了。

六朝的繙譯事業與兩漢的訓詁事業，雖均為述而不作的勞動，性質似乎相同，其實就精神上和效果上說起來，却大不相同。漢代的經師當思想由盛而衰之際，其功作僅止於抱殘守缺，毫無進展，當其任者也多係拘謹迂濶的書生，並無非常傑出之才，故影響社會極小。六朝則正當思想革新的機會，外來的學說完全新穎為向來所未見，足以吸引第一流人才的注意，而其內容博大精深，又足以維繫人心的信仰，故繙譯者妙契微言，聽受者共樂新義，

影響之大就決非區區漢代經師所可比了。

六朝時代，正在輸入印度思想之際，大家都努力於介紹的工作，不暇咀嚼消化，在創造上無甚表現，不過單以介紹而論，已使中國思想界得了一支新生力軍，發生一種新的變化罷了。到了六朝末年，繙譯的工作業已將次圓滿，印度思想重要的部分業已差不多都介紹過來，中國的學者接收了這一批新禮物之後，自然要逐漸求其與固有思想調和融化而另創出一種新東西來。自北魏中葉的淨土宗起，到隋朝的天台宗，唐初的華嚴、禪宗等，都是中國人自創的東西，就是法相宗雖從印度輸入，也是經過玄奘法師的改良，另有一番新意義的。

佛教到了唐朝中葉，已經發達到了極點，種種新義都已發揮淨盡，物極必反，以後的佛教便往下坡路走了。唐朝末年的佛教徒驕奢淫佚，愚昧無知，已不能盡饜人心，學士大夫漸漸有另闢新路的動機，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翱都是有志開闢新路的嘗試者，不過時機未熟，成就不大。到了晚唐五代的喪亂時期俱已過去，北宋的政治統一開幕，因着政治的和

平安定，思想得以醞釀發舒以至於成熟。北宋中葉以後歐陽修、王安石的實利主義和二程子的理學俱已成立，到南宋以至於元，便全是理學家的天下了。

理學起於北宋，大成於南宋，而盛於元及明初，元明兩代經過政治當局有意的提倡，簡直成為一種變相的宗教，為人主箝制人心的工具了。末流之弊自然趨於谿刻，到明朝中葉反動漸起。一部分名士文人，專模倣浪漫的感情生活，雖為理學直接的反動，但在思想上無切實的立足點，尚非重要，在思想上占重要地位的，則為王守仁之良知學說。王學雖仍不脫理學之名，但實際上主張直接痛快，破壞一切，已超出宋儒的範圍，非理學所能拘束了。

這種對於宋儒理學的反動，一經開始其勢不可復止，故到明末清初受了國家時局的激刺，便有更新的思想萌芽。黃宗羲、顧諟、王夫之、傅山、顏元等都各有新學派出現，不但宋儒拘他不住，即陽明學說也漸成過去了。這時候真是個新機萌芽的時代。不幸清聖祖以後，專制日亟，文網日密，屢興摧殘思想的大獄，又用利誘手段，以爵祿牢籠學者，以辭章銷磨志氣，因此思想界受此挫折，不能照直線往前進行。不得已以玩物喪志的考據之學來銷磨歲月，

清代考據學之盛，正清代思想界之不幸。但思想終非禁錮所能終了的。清代嘉道以後，禁網漸疏，新思想逐漸復活，魏源、龔自珍等皆其代表。假使無歐洲思想的輸入，這種思想也會逐漸發育起來，成為系統的學說的。恰好歐洲的思想又適在這個時機輸入進來，給思想界添了一支非常有力的生力軍，恰如六朝時代之輸入印度思想一樣。自清末以至今日都和六朝的初期相似，是一個努力介紹的時代，不過尙無像六朝時代那樣大規模的忠實介紹罷了。但這種機運一動，決難中止，歐洲思想終有盡量地輸入中國之一日，前途之光明正未有艾哩。

綜觀中國思想界的大勢，自原始的神道思想進而為先秦諸子系統的學說，又吸收印度思想而造成宋明的理學，最後則歐洲思想輸入，極恢奇變詭之致。足見民族創造力之大，融和力之偉，思想終無中斷之一日，這就是我們所可引為樂觀的地方了。

第一章 原始中國民族的神話思想

原始的中國民族並不是整個的，極概括地分起來至少也可以分為八九個不同的民

族，各種民族占據的環境既不同，又因古代交通不便，彼此聲息隔絕，無從交換意見，結果自然易於造成特殊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有的漸滅無聞，有的日益光大，有的與他族思想相互混合造成今日整個的中國思想，其情形各不相同。已經漸滅的思想，我們今日考證起來，尤為困難。大抵民族思想之發展遲速，內容豐嗇，與民族所處的環境大有關係。原始的許多中國民族之中，其較有獨立的思想系統堪令人注意者，僅有分布黃河流域的諸夏族和淮水流域的東夷族，此外巴蜀民族雖有文化，而因與中國交通較遲，紀載已多軼滅，無從考起。荆蠻氐羌等族文化較低，表現甚少。閩粵北狄西藏諸族，距中原荒遠，文化發展也較後，更無思想之可言。惟今日盤踞珠江上流山地之苗族，古代相傳分布的勢力較廣，文化的開闢也較早，其思想內容也有可以注意之處，惜乎可考的紀載也不多了。

〔註〕關於上古民族分配的情形，可參看拙著中國民族小史（上海愛文書局出版）及

中國史鳥瞰（北京文化書社代售）

在這許多民族之中，最可注意的自然是諸夏族，因為他是中國民族的主幹，他的文化

發達也最早，流傳下來的也最多，所以無論是任何種類的中國歷史都不能不以他的事件爲主幹。諸夏族的來源有人說是從中央亞洲遷來，有的說是中國土著，我們姑不具論，總之自有歷史以來，這個民族業已盤踞在黃河流域的中部，即今河南省及山東省的西部，山西省的西部一帶，這一帶地勢平衍，土脈肥沃，易於產生文化，但氣候並不甚熱，在古代水患也較多，故人民不能過於逸樂，產生很高尚的思想，只有與生活有關的平實思想容易成立，故其思想多趨於穩健切實。這一塊大平原之中，除了西方有山嶺以與陝甘一帶的氐羌族（戎人）相隔離之外，南北東三面都無險可守，和異民族容易接觸，南方則有苗族，後來的荆蠻不知與苗族是同種否，大約彼此接近，東方則有東夷，北方則有北狄，除北狄因環境不良，略無文化及思想可考見外，苗族及東夷的文化發展也都很早，都有獨立的思想系統，可以與諸夏相交換。上古諸夏族的敵人，最初是苗族，其後是東夷。苗族自黃帝斬蚩尤於中冀，堯勝南蠻於丹水之浦以後，逐漸失敗南竄至長江流域，已失了與諸夏衝突的機會。他們的思想一部分被諸夏族吸收，變成中國民族思想的一分子，大部分猶遺留於江漢之間，直到楚